

一般文獻中或是著重環境與秉賦限制性的因素，或是強調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的決定性影響，但甚少談論發展策略如何形成。文獻中雖然都假設有不同的發展策略存在，但幾乎都沒有談到策略的形成過程，以及策略形成時，決策者所持有的對於政策行動相關的預測、假設以及意圖。任何關於政策形成的討論，也多半是著眼於各種利益團體「必然會如何影響政策的分析」但甚少討論決策者的目的與意圖為何。

譬如，這二三十年來，將拉丁美洲國家與東亞國家作比較研究的文獻汗牛充棟，但多半強調階級結構差異所造成的影響。亦即拉丁美洲國家大地主與其他階層利益衝突，造成政策上的搖擺反覆與經濟的落後，而東亞國家則能保持相對於社會的高度自主性，易於推動有利於整體經濟成長的政策等等。

這些分析基本上沿著結構決定論的理路，而沒有處理主觀或文化因素的作用。當然這些因素處理上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，但並不表示其不重要。

拉丁美洲與東亞國家的差異何在？拉美國家並非從一開始就排斥出口導向策略，其與東亞不同之處在於政府比較不會去取消或限制保護的期限，因此工業難以進步因而缺乏競爭力不易出口。差異不能只是從國家的能力來解釋，而牽涉到發展的意志(the will to develop)。在為了處理問題而須從各種政策方案中作選擇時，相較於拉美國家，東亞國家的決策者比較會考慮到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的前景。國家的獨立性、甚或社會的和諧，這就是發展意志上差異的顯現。

為何會有發展意志上的差異？若追隨 Gerschenkron (1962)關於落後者的優勢的說法，則可提出「落後感 (the sense of backwardness)」的概念，亦即落後國家的菁英對國家在國際上地位落後的共同感受程度顯然，相較於拉美國家，東亞菁英對於國家地位落後有較強烈的共同感受，對於國家要迎頭趕上有高度共識。落後感與菁英個人經驗有關，而拉美的菁英文化源自西歐，拉美菁英作為個人在文化上未必會有落後感，甚至會瞧不起北方先進國知識份子的文化素養。

但東亞菁英的處境顯然不同。東亞菁英因為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較大，身處在西方文明主導的國際場域之中，既然西方文明被認為是必備的知識，就容易會因為對西方文化的不熟悉而產生落後感，甚至羞愧感。

同時，在二次戰後初期，拉美經濟水準甚高，社會上層的文化也可與歐美抗衡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輩出，不易感覺落後。再則，拉美社會種族與階層分化比較嚴重，較缺乏國家觀念(a sense of nationhood)。同時，拉美較缺乏為未來壓抑消費的文化(the capacity to defer gratification)，上層階級維持著消費進口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費文化。

若進一步探究，相較於其他曾淪為殖民地的落後國家，為何東亞菁英的屈辱感看來比較一致並且強烈？這或許和科舉制度以及儒家道統傳承下，文人官紳一體擔負起治國責任的傳統有關；或許和東亞文明曾經達到的高度有關。要探討東亞

文明對東亞經濟成長的影響，從這些角度去探究或許會有比較有意義的結果。

爲了解釋東亞國家的發展取向，有些政治學者曾強調冷戰下外在威脅及競爭的因素，即緊鄰的共產北韓及中共的威脅，促使國府與南韓努力發展這也是延續前述的結構決定論的理路，但實際上，歷史一再證明且有太多案例顯示，外在的威脅並不必然會帶來內在的改革與自強。

關鍵詞：拉丁美洲，東亞，經濟發展，文化因素，發展意志

本文由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瞿宛文撰寫，論文摘自：

Dore, Ronald, 1990, 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, in Gereffi, G. and D. Wyman (eds.), *Manufacturing Miracles: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*, Princeton: Princeton UP. 353-67.